

表现他者

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

〔澳〕欧阳昱 著

1888-1988

新华出版社

表 现 他 者

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

1888 - 1988

[澳大利亚] 欧阳昱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 1888～1988/ (澳) 欧阳昱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6

ISBN 7-5011-4857-0

I. 表… II. 欧… III. ①小说-人物-文学研究-澳大利亚-近代 ②小说-人物-文学研究-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4168 号

表现他者

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 1888-1988

[澳大利亚] 欧阳昱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199,000 字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857-0/I·250 定价：16.00 元

(内部发行)

序

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是 19 世纪 40 年代清政府派遣的一些劳工，而大批的出现，则是在 1851 年墨尔本附近发现金矿之后，最多时达四万之众。他们的境遇极差，挣扎在社会底层且不必说，还常常遭遇针对他们的骚乱，受到无端的劫掠、毒打和杀戮。这些都有史为证。

尽管澳大利亚历史文献称，早期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华人“勤劳俭朴、奉公守法”（“frugal, hard-working and law-abiding”），是“整个社会的典范”（“an example to the whole community”），但在澳大利亚文学家笔下，华人却成了邋邋遢遢、奸诈狡猾、心怀鬼胎、面目可憎的“异类”。无论是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劳森早期的短篇小说，还是费兰克林的传世之作《我的光辉生涯》以及今天仍拥有众多读者的名著《遥远的土地》，都不乏这类华人形象。

为什么现实中的华人和艺术中的华人，距离会那么远呢？一个现成的答案是，作家的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使然。但是，我们不妨再深究一下，这种强烈的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从文化大背景看，澳大利亚文化是一种欧洲文化，原先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脱离母体，被强制移植到了南半球的大洋洲，孤独地成为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亚洲文化的近邻。在强大的亚洲文化的挤压下，它显得势单力薄，因而便有了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排外性，对外来文化保持高度警惕，以

免受浸润和同化。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不过是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外化。

澳大利亚的学者都直言不讳地指出，早期的澳大利亚人有着普遍的自卑心理，总觉得比之英国人，自己不过是“二等公民”，当然内心难免愤愤然很不平衡。排遣这种心情的最好办法，是寻找地位比自己更低的人，即所谓的“三等或四等公民”，以对他们的歧视来发泄自己被歧视的愤恨，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于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移民，尤其是华人，成了被歧视者所歧视的对象。文学作品里华人之被肆意扭曲，正是那种微妙的民族心理现实在艺术中的投影。

此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地理原因。澳大利亚四面环海，在交通与通讯相对落后的年代里，这客观上促成了她的自我封闭。而澳洲大陆本身又地广人稀，定居点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距离。澳大利亚外部和内部所同时存在的距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澳大利亚与外部世界、澳大利亚本地人与外来民族之间的隔膜，使人轻信“黄祸”之类的谣传，对中国移民产生莫名的憎恨。“异类”形象是这种情绪的艺术宣泄。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针对亚洲移民的“白澳政策”的取消，因现代通讯的发展澳大利亚与世界距离的缩短，澳大利亚民族自身的日益强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种族歧视已大为收敛，排外情绪有所淡化，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华人形象逐渐改善，尽管未必完全真实，但以往那种情绪化的扭曲已经基本消解了。

欧阳昱多年来潜心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并有多种著译在国内外出版，除了论文、专著和译著外，还有分别用中英语写作的小说和诗歌。他的多才多艺和博学，引起了澳大利亚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诗评家称他为“新诗人”，澳大利亚理事会多次资助他的写作和研究，多所大学请他去作讲座。他已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界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这部著作是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

成果，对澳大利亚书籍中华人形象的论述，详尽、周全而有见地，值得一读。

2000年3月10日

于上海七宝斋

引 言

根据历史记载，中国人第一次入澳，时间是 1848 年。当一百多名中国人乘坐 Nimrod 号轮船从福建厦门启航，抵达悉尼港时，他们不知道，他们从到达的第一天起，就被人悄悄地写进了澳大利亚历史、小说、诗歌和其他题材的作品中。这一过程至今持续了整整 150 年。150 年来，中国人在这片大陆上繁衍、生存、开拓、奋斗，足迹遍及澳洲大陆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故事是可歌可泣、可传可诵的，但在他们并不熟悉的另一个言语中，在白人文学的传统中，他们从最开始就以“他者”或“异类”的形象出现，又通过各种文学形象和手段被定型下来，成为澳大利亚文学中一个不能吸收、难以同化、形象丑陋的群体。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人的形象问题。

中国人的形象问题涉及面很广。文学方面，可以说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都有中国人的形象出现，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等，不一而足。因篇幅限制，本书拟就 100 年来（1888 - 1988）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集中进行讨论，同时广泛引证其他体裁作品中的素材，以达到旁征博引、资料翔实的效果。历史方面，专门研究中国人在澳的著作就不下十数本，本书拟在进入正题之前，提供一个中国人入澳和居澳史的简图，使中国读者对此有一个概要的了解。形象问题还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表现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在目前众多的

西方理论中，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为深入探讨本题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论武器，我拟在讨论过程当中运用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其它相关理论对澳大利亚文学中表现中国人的问题进行评论和阐述，并由此引出对东西方表现不平衡现象的个人思考，以便与对本题有兴趣者进行交流。最后，我还想简要介绍一下1988年以来到现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对中国人的表现上所出现的新动向和新思潮，使中国读者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与理论问题

第一章 中国问题：历史的回顾	3
第二章 他者问题：东方主义话语	10

第二部分：1888—1901

第三章 “中国邪教徒”	25
第一节 《公报》作家群和“这些中国坏蛋”	25
第二节 黄潮滚滚	37
第三节 西上东下的权力结构	46
第四节 尼斯贝特：一个例外	57

第三部分：1902—1949

第四章 “居心险恶的东方人”	83
第一节 “白澳”与“黄祸”	83
第二节 “滞定型”之延续	95
第三节 双重混血人	102
第四节 英澳作家笔下的中国人	110

第五章	黄脸白心	141
第一节	白色中国人	141
第二节	好中国人	152
第三节	他者的另一半	162

第四部分：1950—1972

第六章	东方主义的政治化	181
第一节	反共作品中的中国人	181
第二节	“香港”小说中的罪与乐	191
第三节	乔治·庄士敦和他的“中国小说”	197
第四节	戴维·马丁的《土城的英雄》及其他	204

第五部分：1973—1988

第七章	走向亚洲	225
第一节	亚洲写作中的中国人表现问题	225
第二节	新“中国小说”中的中国人	235
第三节	在澳大利亚建立“新中国”：从武装侵略到 和平接管	239
第四节	华人作家的“反动”：“他者”表现“他者”	244

结 论	259
-----------	-----

第一部分

历史背景与理论问题

第一章 中国问题：历史的回顾

中国人大批来澳，是在 19 世纪中叶。在此之前是否有中国人登上澳洲大陆，只是一个推测性的问题，^①并不见于正宗的史书。19 世纪早期虽有零零星星的中国人来到澳洲，^②但根据正史，第一批中国人正式踏上澳洲大陆的时间是 1848 年。由于 1851 年澳洲发现金矿，随之掀起“淘金热”的狂潮，世界各地淘金客蜂拥而至，其中也有大量中国人，其人数从 1854 年的 2341 人陡增到 1855 年的 17000 人。到 1859 年，中国淘金工人数达到顶峰，一度曾为 42000 人，^③占来澳的有色人种首位。

大批中国人的到来，使欧洲矿工和中国工人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冲突频生，连续发生数次白人冲击中国人住地、殴打乃至屠杀中国人的惨案，如 1857 年的巴克兰河屠杀，1861 年的兰滨滩暴动和 1873 年的克鲁尼斯暴动。造成双方冲突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文化差异，经济竞争，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等。^④

与此同时，当时的澳大利亚殖民政府也极力推行反华排华政策，1855 年在维多利亚省通过法案，规定装船量每十吨限载一名中国人，并收缴十镑人头税。^⑤以后各州纷纷效仿，非常有效地限制了中国人的入境。1877 年，当大批中国人进入昆士兰州时，全澳又掀起第二次反华浪潮，“中国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在 1880 年的第一次殖民区际会议上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随后除西澳以外，各殖民区都通过了反中国移民法。第二次殖民区际会议于 1888 年召开，此时人们担忧中国移民是在中国政府的鼓

励和支持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在澳大利亚建立中国的殖民地,与白人分庭抗礼。^⑥这次会议秘密召开,并通过一项草案,拟完全禁止传统的中国移民,无视 1860 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对无论是否英国臣民的中国人,均采取排斥手段。^⑦到 1896 年第三次殖民区区际会议召开时,通过了一项“有色人种限制规定”议案,大会一致同意不仅排斥中国人,而且排斥所有的有色人种,包括“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岛屿的原居民”^⑧。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把中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完全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他者”的立场,并于 1901 年终于形成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澳大利亚国策“白澳政策。”正如澳大利亚史学家查尔斯·普莱斯所指出:“年轻的新社会正是借助中国人这块铁砧把自己的国民性慢慢地敲打出来的。”^⑨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反华排华并不仅仅局限在澳大利亚,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中国人所到之处,除北婆罗州和巴西外,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⑩对“黄祸”的恐惧使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纷纷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限制或防止中国人入境,美国率先于 1882 年通过排华法案,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分别于 1885 年^⑪和 1899 年^⑫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尽管如此,以反华排华为手段,以便达到从澳洲全面彻底清除所有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和亚洲人之目的的这种种族主义政策最终能演变成“白澳政策”,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奠基石,这在其它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程度,更从思想上说明了反华排华运动对建立澳大利亚国民精神之重要,实际上,澳大利亚联邦诞生之日,就是中国人正式成为“异类”之时。澳大利亚史学家杰弗里·布雷尼教授曾经指出:

即便没有中国人，澳大利亚人也会把他们发明出来。每个社会都需要替罪羊，需要打击的对象。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几乎把中国人作为衡量他们自己的标准，衡量之下，他们觉得自己还挺不错。^⑬

“白澳政策”于1901年制定之后，延续达67年之久，历届政府都把这项政策作为立国之本，“保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⑭“白澳政策”实行之后不久，在澳的中国人人数锐减，从1901年的三万人减至1947年的九千多人，其中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为3700人，中国出生的为5416人。^⑮

不过，自此以后，中澳关系也有所改善，清政府于1909年第一次向澳大利亚派出总领事，并与澳洲政府签订了护照协议，方便中国学生和商人来澳。^⑯1934年，澳大利亚外事部长约翰·雷萨姆爵士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在南京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讨论了贸易和其它问题。^⑰澳大利亚政府还于1941年在中国建立了公使馆，它与国民党政府所保持的这种外交关系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这段时间，澳洲民间对华人态度也有所好转，一方面是因为“白澳政策”受到澳洲一些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这从当时出的几本书名上可见一斑，如1903年爱德华·W. 福克索尔（Edward W. Foxall）发表的《恐色症——揭露“白澳”谬误》（*Colorphobia: An Exposure of the White Australia Fallacy*），E.W. 科尔（E.W. Cole）分别于1903年和1918年出版的《白澳不可能成功》（*A White Australia Impossible*）和《中国人性中好的一面》（*Better Sid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两书，以及埃尔得里德·波庭杰（Eldred Pottinger）于1928年出版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几个亚洲问题》（*Asiatic Problems Affecting Australia*），其观点将在以后章节中详细讨论。另一方面也由于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共

102587

产党通过传媒宣传“白澳政策”种族主义的危害性，倡导对中国人和有色人种的友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和认识。^⑮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澳大利亚同盟国，使澳大利亚人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民间态度从恐华到亲华，来了一个大转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澳大利亚政府不予承认，而是追随美国，继续保持其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在“冷战”期间，由于中澳两国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国人从以前的“黄祸”（Yellow Peril）形象一变而为“红色威胁”（Red Mence），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一直被澳大利亚视为头号敌人。^⑯大众传媒中经常出现“中共向下挺进”的字眼。^⑰然而，由于活跃的澳共（马列）和具有左倾思想的作家不顾政府阻挠，与中国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并以积极的态度在作品中反映新中国的生活，^⑱这一时期反映中国和中国人的小说作品因此出现十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中国人形象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作者的政治态度和倾向。

世界处于冷战时期的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与亚洲各国修好，如在50年代中期开展“科隆坡计划”，资助并邀请亚洲学生来澳学习，^⑲1958年取消“白澳政策”核心部分的“听力测验”^⑳，1968年废除“白澳政策”，最后于1972年与中国建交。随着“白澳”成为过去，中澳关系正常化，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对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对外采取进入亚洲、成为亚洲一个部分的政策，华人在澳地位逐年上升，人口也不断增长。1988年，李鹏总理带团访问澳大利亚，把中澳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高潮。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文学中出现了新品种，称为“亚洲小说”，其中也包括描写中国的小说，这是澳大利亚作家把注意力转向亚洲，在澳洲向亚洲靠拢的历史进程中所作的努力，尽管其中功过还有待评说，但总的趋向还是

积极的。

不过，“白澳政策”虽已解体，但种族主义阴魂不散，一有机会便要抬头。1984年澳大利亚曾就亚洲移民问题展开过大辩论，以杰弗里·布雷尼教授为代表的反对者的观点认为，澳大利亚从亚洲移民等于是“从亚洲输入失业”，会造成澳洲社会的“不和谐”，“输入少数民族”会给“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社会带来危险”，^④等等。1988年澳大利亚200周年庆典之时，这些理论又沉渣泛起，如现任总理、当时的反对党领袖约翰·霍华德就曾竭力主张“一个国家”的理论，^⑤澳洲社会对多元文化的阻力和种族主义的暗流时隐时现，表现在小说中就是那种以中国人为罪魁祸首的长盛不衰的“侵略小说”。在1998年，“单一国家党”党魁波琳·韩莘（Pauline Hanson）更以积极反亚、反多元文化的姿态出现在澳大利亚政治舞台上，一时间乌云滚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和中国人再次处于不安定的状态，情况堪忧。但20世纪末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早已成主流，“单一国家党”在大选中的彻底失败和它目前的衰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 香港学者卫聚贤在其专著《中国人发现澳洲》中指出，根据历史文献，中国人早于公元前592年和公元1492年就往返于澳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之间。见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香港说文社中兴丛书，1950年，第184页。

② 根据莫拉格·罗（Morag Loh）的《正直而真诚：中国移民和华裔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防御力量和战争努力的贡献 1899—1988》（Dinky - Di: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ustralian's of Chinese Descent to Australia's Defence Forces and War Efforts 1899 - 1988），华人最早来澳的时间是1829年。堪培拉：AGPS出版社，1989年，第4页。又据海伦娜·钟（Helene Chung）的《来自中国的呼喊》（Shouting from China）一书，1830年7月9日